

文化形態史觀

中國先秦史觀

作者：雷海宗・林同濟



YEH CHYANG

業強出版社 / 印行

重印「文化形態史觀」序

這一本小冊子——文化形態史觀——我已保存了二十三年，現在重新付梓，是一件極具意義和愉快的事！

這本書裏面的文章，都是由林同濟、雷海宗二位先生所寫的短篇論文收集而成的。這些短篇論文係於抗戰期間在昆明和重慶兩個地方發表的，當時林先生任教國立雲南大學，而雷先生則任教國立西南聯大，二人先後在昆明創辦「戰國策半月刊」及在重慶報上創辦「戰國副刊」，這些文章就是在這兩個刊物上發表的。從發表的時間來說，這些文章最早的已有三十年，較晚的也有二十七八年。可是，三十年來的變化，這書中所預言的一切，都一一呈現。我們為瞭解當前的國際情勢，及未來人類文化的可能發展，並瞭解我們自己今日所處之境地，因而謀求所以適應之道，這本書的重印是十分有意義的事。

什麼叫做「文化形態史觀」呢？據本書著者林同濟先生所說，這是一種運用「文化統相法」來觀察人類歷史文化發展所得到的一種看法。所謂「文化統相法」，就是用一種「全體」的眼光

來觀察歷史文化發展的方法，用這種方法來觀察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則可發現不同的人類文化，有共同的發展過程和形態。因此，「文化形態史觀」又叫做「歷史形態學」。這是世界學術史上的一種創舉。在西方，首先運用這種方法來建立「歷史形態學」的人是德國的斯賓格勒（O. Spengler），後來英國的湯恩比（A. J. Toynbee）繼之，都有極大的成就。在中國，對這方面有極大貢獻的就是林、雷二先生。而且，可能由於林、雷二先生是中國人之故，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看法有獨特之處，這是上述二人所不可及的。

從「歷史形態學」的觀點來觀察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可發現下列事實：（一）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不是按照直線進行的，即不是永遠前進的；而是按照拋物線進行的，即是由生長盛衰而至滅亡的。（二）世界史的發展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即自新石器時代以後的人類，在世界上的不同空間和時間中，各自產生不同的文化系統。這些文化系統各自按照生長盛衰的過程進行。（三）每一個文化系統的個性儘管不同，但是，它們在生長盛衰過程中所表現的形態却相同；這些形態，林同濟先生區分為三個階段：即 1. 封建階段；2. 列國階段及 3. 大一統階段。雷海宗先生則區分為五個時代：即 1. 封建時代，2. 貴族國家時代（或稱春秋時代），3. 帝國主義時代（或稱戰國時代），（林同濟先生則合稱此 2、3 兩時代為「列國階段」），4. 大一統時代及 5. 文化破裂時代。（四）每一個文化從生長興盛以至衰亡，其所經過的時間亦大致相同，即約一千四百五十年左右，其中封建時代約六百年，貴族國家時代約三百年，帝國主義時代約二百五十年，大一

統時代約三百年。大一統之後便是文化破裂時代，其時間則可長可短。

在上述文化進展的各階段中，每一個階段都表現它的獨特的形態，這些形態可以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及宗教精神生活方面來理解。譬如在封建時代，政治上是「分權」制度，天子只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並不能統治天下，他的權力分散給各國的諸侯，諸侯也不能統治全國，他的權力分散給下面的卿大夫，卿大夫也不能統治全部封土，他們的權力又要分散給下面的大小家臣等等，這個時候人的價值中心觀念是「上下之別」。在軍事上這一時期只有貴族有當兵的權利，大規模的戰爭很少，只有小規模的地方戰亂。在經濟方面是農奴采邑制度，土地是分封的，不得自由買賣的。在社會方面，這一時期的最大特色便是法定的社會階級制度，每一個人的職業都是世襲的，而且每一個人都以能繼承其「世業」為一生的光榮職責；本來階級的差別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但是由公認的法則來規定每一個人的社會階級地位，則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在宗教精神生活方面，這一時期可說是宗教的天下，人民以崇拜祖先為主，但除崇拜祖先外，宇宙間充滿着無數的神，上至國家大典，下至平民日常生活的例行事務，都由宗教的儀式所規定，但是正式祀神的權利則是貴族所專有的。

到了貴族國家時代（春秋時代），情形便發生變化，政治上中間階級也就是貴族階級（諸侯）抬頭，主權分化的現象逐漸消失，天子成了傀儡，諸侯下面的卿大夫權力也被削弱，唯一握大權的是中間階級——諸侯國君；由於主權分化的現象逐漸消失，上下階級之分也逐漸消滅，平民

升為貴族變為可能，國家的形態逐漸形成，前此封建時代的「上下之別」，現在變為「內外之分」。軍事上由於這時國家形態之成立，乃逐漸發生國際戰爭，但戰爭的目的只是在維持國際間的均勢，一國併吞他國之現象尚未發生，尤其特殊的是這一時期的人養成貴士俠義之風，戰場上還要保持一定的禮儀；此外，在這一時期當兵已不是貴族的專權，平民已可入伍，但掌握軍令權力的仍屬貴族階級。在經濟方面，采邑制度開始破壞，土地已可自由買賣，商人經濟逐漸抬頭。在社會方面，世襲的階級制度逐漸消滅，人民「上下」的層級觀念，轉變為「平等」的觀念。宗教精神生活方面，這時的宗教信仰雖仍維持，但人類的精神活動已由對神的信仰轉變為理性的獨立思考，偉大的哲學家在此一時期誕生，例如中國先秦時代的孔子，希臘古代的蘇格拉底及近代西歐的康德等是。

到了帝國主義時代（戰國時代），則在各方面都發生很大的變化，政治上貴族階級被推翻，平民奪得政權，形成了一個在表面上看來是全民平等的社會。在軍事上，這時期列國對峙，大規模的戰爭從此開始，戰場上不再保持彬彬的禮儀，而是愈詭譎愈狡詐愈好；戰爭的目的不再是在維持國際間的均勢，而是在殲滅對方的主力，併吞別國的領土。併吞的結果，國際間只剩下二三個強國對峙，最後則變為二強對峙以從事最後決戰；在兵役方面，從前當兵主要是貴族的權利，而到了這一時期，則變為全民皆兵，徵兵制度從此成立。在經濟方面，土地分封制度徹底破壞，（如商鞅之破壞井田制度），商品自由經濟是這一時期的特徵。到了末期，則為適應戰爭的需要

，會有統制經濟的現象發生。在社會方面，最初是全民平等的社會，但到了後期，出現獨裁政治，個體之自由乃在「國家至上」的目標下受到限制。在學術思想方面，短時間內會表現百家爭鳴，文化開花的景象。但這只是迴光返照，不久思想即趨於派別化，創造的思想逐漸消失，最後連派別化的思想也歸於消沉，只剩下一些沒有中心見解的雜家，寫些雜亂無章的大書。

到了大一統時代，是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這時經過了戰國時代的大規模戰爭後，一國併吞列國，統一天下，政治上形成大一統的局面。在大一統的局面下，專制皇權高高在上，下面則是無「內外」差別的億萬兆民；這時通常會完成一種官僚制度，這種制度在戰國時代已開其端，但其作用不同，戰國時代的官僚制度目的在擢升平民參政，以適應戰國的需求；而大一統時代的官僚制度，則表面上是在「選賢用能」，而實際上則是專制皇權藉此來羈縻人心。在軍事上，大一統時代的最初短期間內，會顯出一種武功極盛的狀況，疆土擴展到空前的程度，但這只是迴光返照。過此以往便往下墜落，人民厭惡戰爭，徵兵制度不能維持，只好改為募兵，後來募兵也不能維持，便只得強徵囚犯和奴隸或招募邊疆歸化的夷狄來當兵，尚武精神從此衰退。在經濟方面，這時會出現「國營」或「官辦」的事業，這些事業最初尚能為國計民生做些事情，後來便變為中飽私囊的機構。在宗教精神生活方面，在最初的期間內專制君主會創出一種「皇帝崇拜」的信仰來羈縻人心，但是士大夫階級經過列國階段的理性運動後，不可能產生「皇帝崇拜」的熱情；這時代初期的士大夫，通常會產生一種泛神式的自然哲學，然後便發展成為虛無主義；至於下層的

大眾，則產生雜教邪宗以求自我安慰，這種雜教邪宗發展而為流寇暴動，最後則野蠻民族入侵，帝國宣告覆亡。

以上便是用「歷史形態學」的方法觀察人類歷史文化發展過程的大概情形。斯賓格勒在其「西方沒落」一書中，曾舉出七個文化形態，其過程是如此；湯恩比在其「歷史研究」一書中則舉出二十一個文化形態，其過程亦莫不如此。林、雷二先生則舉出七個文化形態，大致與斯賓格勒相同。此七個形態為：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歐西。其中埃及、希臘羅馬、歐西及中國四個文化系統的發展過程，雷海宗先生在其「歷史的形態與例證」一文中，曾作簡賅的敘述。

現在發生這樣的問題：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何以會表現這樣的形態呢？林、雷二先生的回答是：我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是，我們如對上列歷史文化發展過程的事實，作一較深入的觀察，則至少可得到下面進一步的認識，即在每一階段所表現的歷史形態中，有一個價值的中心觀念在支配著這一階段整個形態的各方面。例如在封建時代，為什麼在這一時代政治上要採取分權制度呢？這是因為分權制度適合這一時代人的「上下之別」的價值中心觀念之故；這個時代的「上下之別」的觀念，是一個相對的觀念，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上下之別都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不僅自諸侯以下至卿大夫不是「上」，連天子也不是「上」，因為如果天子是「上」，就不該稱為「天子」，而該稱為「天帝」了。那麼，什麼才是最「上」呢？只有「天」

（形而上的天）才是最「上」，這個「天」就是「上帝」。所有在現實世界中的人——自天子以至庶人——都是「下」，都仰望着「上帝」而作價值上的提升。因此之故，任何人（包括天子在內）都不得獨霸天下，而只能站在自己層級所分配的崗位上盡其本分，以皈依上帝而已，這就是分權制度的由來。所以廣義的說，這一時代是宗教的時代。其次，這個時代的「上下之別」，是以接近「天」（上帝）的遠近程度來區分的，天子最近，諸侯次之，卿大夫又次之，士又次之，庶人最遠，愈接近者價值愈高，愈遠者愈低，祭天是這個時代天子的特權，其原因在此。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了解這一時代的軍事、經濟、社會及宗教精神生活各方面，都是「上下之別」價值觀念的表現。就軍事來說：這一時期當兵是貴族的特權，平民不得參軍，這並不是說平民怕死，而貴族不怕死，而乃是因為這一時代的人認為保國勤王是神聖的事，只有價值較高的人（貴族階級）才配擔當這種任務。再就經濟上來說：這一時期的農奴采邑制度以及土地不得自由買賣等，是配合政治上的分權制度而來的。政治上的分權既是秉承天意而來，則土地的分封自然也是秉承天意而來的，秉承天意而來的土地當然是不得自由買賣的；同時，以價值最低的人——農奴——從事耕作，在「上下之別」的觀念上說，也是合理的事。再從社會上說，這一時期的人都被規定了法定的社會階級，職業世襲，不得逾越，這就是充分的「上下之別」價值觀念的表現。再就宗教精神生活來說，這一時期的人崇拜祖先，崇拜多神，日常生活乃至國家大典都由種種宗教儀式所規定，這就表示這一時期的人，認為宇宙充滿着神力，宇宙的一切都由神所支配，神的最後根

祇就是「天」。所以，這一個時代就是宗教的時代。

其次就列國時代來說，列國時代雷海宗先生區分為二部分：一為「貴族國家時代」，（用中國話說是「春秋時代」）；一為「帝國主義時代」，（用中國話說是「戰國時代」）。林同濟先生則合稱二者為「列國階段」；我們無妨把前者稱為列國階段第一期，後者稱為列國階段第二期。在此兩時期中有一個共同的價值中心觀念，就是「國家至上」。在封建時代的最高價值目標——天（上帝），到這時被搬到地面上來，成為「國家」。這時候的人固然仍有宗教信仰，但這已居於次要的地位，這時的價值中心觀念是「國家」，這個時代的人以盡瘁「國家」為畢生的最高價值目標。在第一時期（春秋時代）國君（諸侯）得勢，天子權力式微，在國君之下的卿大夫也失勢，反而平民逐漸興起得參與政權，這就表示封建開始崩潰而走向「國家」化的第一步；到了第二時期（戰國時代），天子消滅，國君亦被推翻或名存實亡，而由平民獲得政權，成為「平民政治」，這種「平民政治」便是「國家」價值中心觀念發展最高峯的表現。在軍事上，這一階段從有限度的維持國際均勢的戰爭，發展而為大規模的國際殲滅戰，從平民入伍發展而為全民皆兵的徵兵制度；在經濟上采邑制度徹底破壞後，從自由商品經濟逐漸進而為統制經濟；在社會上從提倡自由平等觀念，逐漸轉變為集體主義觀念；在精神生活上，宗教思想衰退，理性主義抬頭，哲人輩出，而後思想又趨於派別化等等，這些都是列國階段「國家」價值中心觀念興起發展過程的表現。

再其次說到大一統時代，這一時代的價值中心觀念是「養生」。「養生」這個名詞表面上看是個具有積極意味的價值觀念，而實際上則是一個反價值的觀念。這個時代的人，一切價值觀念都消失了——既失掉原始宗教的價值觀念，又失掉「國家至上」的價值觀念，最後剩下的只有一個身體，人生之目的就在滿足這個身體的欲望。於是乎這個時代的一切表現，都是直接或間接以達到「養生」的欲望為目的。譬如政治上這個時代的專制皇權，無論如何專橫，只要能維持民衆的肉體生存，這些兆民就能忍耐。尤其是這一時期的官僚制度，是最適合「養生」的一種制度，因為它可使人名利雙收。作官可以求名，作官又可以「中飽」。「中飽」是用不道德的手段來獲取金錢，獲取金錢的目的不外「養生」，所以「養生」是個反價值的觀念。此外，這一時期的人不肯當兵，尚武精神衰退；經濟上初期興辦「國營」「官辦」事業，原為解決人民的「養生」問題，後來却成了「中飽」的機構；社會上人民生活墮落，游手好閒，甚至寧可接受國家救濟也不願工作；在精神生活上則士大夫流為虛無主義，下層大眾則尋求邪教邪宗以自我安慰等等，這些都是以「養生」為「價值」中心觀念所表現出來的必然現象和結果。

所以，歷史形態的發展過程，從深一層看時，則實是人類價值中心觀念的發展過程——從宗教價值中心觀念發展而為「國家」價值的中心觀念，然後由國家價值中心觀念墮落為反價值的「養生」觀念；「養生」觀念之後，便是人類文化的滅亡。

現在我們來看林、雷二先生用「歷史形態學」的方法來觀察當前世界文化態勢及我們中國文

化過去發展狀況及當前處境的情形，他們發現：（一）現在世界上唯一未走完文化各階段的文化系統，是西歐的文化，這個文化正在「戰國」階段中進行，並向着「大一統」階段前進；（筆者案：斯賓格勒曾列舉蘇俄亦為一新興的文化系統，林、雷二先生未採用）；（二）我們中國的文化獨具二週——這是雷海宗先生的獨特發現，第一週自殷商西周至五胡亂華，第二週自南北朝隋唐五代至清末以下。（詳見本書雷海宗著「獨具二週的中國文化」一文）。現在是我們第二週文化衰頹的時候，我們中國人現代所發生的種種問題，都是一個衰頹的大一統文化遭遇一個「戰國」文化的「適應性」的難產問題。林、雷二先生的話是在三十年以前說的，到三十年後的今天，這些話仍然有效；並且，當前的國際態勢及我們自己所處的狀況，正向着林、雷二先生所指的方向邁進。

先從當前世界文化的態勢來說，一般史學家都把希臘、羅馬、中世紀及近代歐洲看作是一個文化系統，而把希臘、羅馬看作是古代，中世紀為中古，而自文藝復興後看作近代，這是極端錯誤的看法。從歷史形態學的觀點看來，則希臘、羅馬合成一個文化系統，而西歐自成一個文化系統，世界上唯一未走完它的文化各階段的就是這個西歐文化系統。依照雷海宗先生所說，西歐文化自西元十世紀初至十六世紀初（九一一—一五一七），是它的封建時代，自十六世紀初至十九世紀初（一五一七—一八一五），是它的「貴族國家時代」。而自十九世紀初至現在則是它的「帝國主義」亦即「戰國時代」，現在這個文化是正在「戰國」階段中進行。依照歷史形態學的看法

法，「戰國」時代綿延的時間大約在二百五十年左右，是則西歐文化到現在（一九七〇）已進入「戰國」階段一百五十五年，大約還要九十五年左右（即至二〇六五年）才能走完這個階段，而進入大一統階段。

戰國時代的特徵是：國際間的戰爭是大規模的殲滅戰，殲滅戰的結果是大國併吞小國，列國對峙的局面乃變為二三強的對峙，二三強的對峙再變為二強對峙，最後二強決戰的結果，一強併吞天下，而進入大一統階段。

林、雷二先生的預言是在三十年以前說的，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交戰雙方諸國都以聯合的姿態出現，尚未成為二強對壘的局面。但戰後情勢便有變化，證明向着上述的預言進行。美俄兩大強國對峙的局面形成，其他的國家（連英法在內），都降為二等三等乃至更不重要的國家；至於蘇俄則乾脆滅掉周圍小國，並把其他鐵幕國家淪為附庸，二強對峙的局面業已形成。或謂近年中共的崛起，使這世界形成三強鼎立的局面，但目前中共尚未至強國的程度，即使將來能成為強國，則依照形態史觀的看法，這種三強鼎立的局面恐不會維持很久，最後必將變為二強，二強再決戰而進入大一統階段，這個最後的結局恐將無可避免地要到來。

又或謂：現代的西歐文化有一個特徵，即發明了原子彈。原子彈的毀滅威力，將使人心存畏懼，而不敢輕易發動戰爭。筆者不否認這種說法的可能性。但是，依照歷史形態學的看法，我們幾乎可以斷言：即使人類由於畏懼原子彈的威力而不敢輕易發動戰爭，但是二強對峙的局面決不

會因此而永遠拖延下去，二強的一方必想盡一切其他辦法（例如滲透等）以消滅對方，使天下歸於統一以進入大一統階段。

不僅當前二強對峙的局面表示西方文化已走進「戰國」階段的下半期，並預示行將進入大一統時代；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也預示着大一統時代行將來臨，那就是西方目前存在主義之流行以及嬉皮士的興起。存在主義象徵虛無主義之哲學，嬉皮士則是人類喪失價值理想後的墮落現象，這兩種情形都是大一統局面形成後才應出現的現象。現在歐美居然出現這種情形，這就預示西歐文化的大一統局面行將降臨，而且可能來臨得比預期為早。這是我們根據歷史形態學的看法觀察當前世界大勢所可得到的預期結論。

現在我們來看看林、雷二先生對我們中國歷史的看法。

雷海宗先生發現：中國文化獨具二週，中國人從殷商時代起至五胡亂華止走完了他們文化的第一週，但走完了這第一週後由於受了外來思想的刺激，再從南北朝隋唐五代起至清末以下創造了他們文化的第二週，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蹟！所有其他的文化——除西歐文化尚未走完它的全部過程外——一經走完它的歷史形態的過程，便一蹶不振，永不再來。只有中國文化能於走完第一週過程後，再創造第二週的過程，這是形態歷史觀所給與我們的最大而令人興奮的啓示！因為這表示中國人的文化精神不死，既然走完第一週後還能創造第二週，那麼走完第二週後我們也有信心創造第三週的文化！

在第一週的過程中，雷先生指出：殷商西周（相當於西元前一三〇〇／七七〇年）是中國的「封建時代」，也就是中國人的宗教時代；春秋時代（相當於西元前七七〇／四七三年）為中國人的「貴族國家時代」，也就是中國人的哲學時代，孔子是這一時代的人物；戰國時代（相當於西元前四七三／二二一年）則是中國人的「帝國主義時代」，這時是哲學派別化和開始退步的時代，「六家」是這種派別化和退步的代表；秦漢至東漢中興（相當於西元前二二一／西元八八年）則是中國的「大一統時代」，這時是哲學消滅與學術化的時代，經學訓詁是哲學消滅和學術化的象徵。東漢末至五胡亂華（相當於西元八九／三八三年）便是文化破裂的時代，這時思想學術并衰，適佛學東來，而佛教之輸入便引發了中國人創造第二週的文化。

可是，第二週的過程與第一週有極大的不同之處，第一週的過程不論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及宗教精神生活各方面，都是一個完整的文化形態的過程；而第二週則不然，第二週的過程只是一個宗教哲學思想方面的單方面的發展過程，而其他方面則完全陷於停滯狀態。因此，第二週發展過程的各階段，便不能以第一週發展過程的名稱來稱呼，而只能以第一週發展過程中宗教哲學思想方面的名稱來稱呼，譬如南北朝隋唐五代雷先生稱之為「宗教時代」，而不稱為「封建時代」，因為此時除佛教大盛外，其他方面沒有絲毫封建時代的痕跡。宋代則稱為「哲學時代」，而不稱為「貴族國家時代」或「春秋時代」，這時的哲學以北宋五子及陸象山為代表，這時除了哲學的興盛外，其他方面沒有絲毫貴族國家的痕跡。元朝則稱為「哲學派別化與開始

退步時代」，而不稱為「帝國主義時代」或「戰國時代」，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時的中國人不但沒有戰國時代的戰鬥精神，反而亡了國，亡給一個沒有文化的外族——蒙古人。蒙古人雖然建立了一個大帝國，但這與中國文化毫不相干，他們既非受中國文化影響而建立此大帝國，他們滅亡中國後也沒有像羅馬人接受希臘文化棒子一樣來接受中國文化的棒子，他們純粹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强悍外族襲擊一個軟弱無能的傳統帝國暴起暴落而已。晚明盛清則稱為「哲學消滅與學術化時代」，而不稱為「大一統時代」，因為這時中國人不但沒有像秦始皇、凱撒這樣的人來用武力消滅列國以建立大一統的帝國，反而第二次亡了國，亡給關外沒有文化的滿洲人。自清以下則是文化破裂的階段，思想學術并衰。恰巧這時碰上一個剛走進戰國階段的西歐文化，具有這個文化的西方民族與過去元、清兩朝的外族不同，元、清兩朝的外族是沒有文化的民族，而西方民族則是具有高度科學技術文化的外族，我們中國人如何能應付呢？

中國第二週文化的發展既是宗教哲學思想學問方面的發展，而其他方面陷於停滯狀態，而這種停滯狀態自該從第一週的末期秦漢大一統時代算起，於今已逾二千年。二千年來的停滯不進，產生種種積重難返的流弊，這些流弊林同濟先生指出四種：（參閱本書林同濟著「官僚傳統」一文）。一是皇權毒，皇權毒就是在專制皇權下所養成的腐敗官僚的毒害，這些官僚只以作官而不以作事為目的，結果凌下詭上，最後變為「蒙」上，以致全國政治為之癱瘓，一旦外族侵凌，便整個帝國土崩瓦解；二是文人毒，文人毒是只作文章不作事的毒害，這種文人是在官僚傳統制

度下養成的；三是宗法毒，宗法毒是大家族制度的毒害，這種制度在戰國時代原遭破壞，但到了大一統時代，專制皇權為了統治方便起見，乃鼓勵大家族制度的復興，這種制度再與官僚制度結合，便產生「任用私人」的惡風；四是錢神毒，這是官僚與商人結合所產生的毒害，官僚表面上壓迫商人，實則暗中勾結商人，貪污中飽，以致商人不能發揮其流通經濟的效用，致使二千年來的中國社會成為生產分配兩無辦法的赤貧社會。這是林同濟先生指出的四種毒害。

除了上述四種毒害外，雷海宗先生在他另一本大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中，曾經指出中國二千年來大一統專制皇權與官僚傳統下所養成的最大毒害，便是「國家」意識的喪失、尚武精神的衰退；尚武精神是「國家」價值中心觀念的表現，一旦「國家」觀念喪失，尚武精神就必然會衰退的。所以雷先生說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化是「無兵的文化」。（見該書第四章）竇憲伐匈奴是利用胡兵打的仗，不是漢人打的仗。像這樣一個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無論在宗教哲學方面如何的發達，一旦強敵入侵（那怕是蠻夷入寇），如何能免於亡國之禍？

由此可知，第二週的文化是個孱弱的文化、不健全的文化。現在是到了第二週的末期，而遇到的是一個具有高度科學水準尚在戰國階段進行的西方文化，我們如何能適應這局面呢？

林、雷二先生發表文化形態史觀的主張時，是在三十年前，當時是在抗戰時代，林先生指出：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一個古老文化遭遇一個戰國文化的「適應性」難產問題。顯然的，他這裏所謂「適應性」的難產，至少應自鴉片戰爭算起至當時的抗戰為止，抗戰是西方文化假手於日

本人對這古老文化的侵襲，這就是「適應性」難產的表現。現在問：抗戰結束至今已二十餘年，到了現在中國人是否已產生「適應性」了呢？

首先我們要明白這裏所謂「適應性」的意義，它的根本意義是指一個古老文化遭遇戰國文化而仍能保持自己的「存在」而言。因此有人或許認為：中國大陸已製造出了原子彈和人造衛星，已側身於強國之林，將來還要繼續發展下去，已可保衛自己的「存在」了，所以中國人已產生了对西方文化的「適應性」了。這話恐未必盡然。我們姑且承認中國大陸上的軍事力量會繼續進展，進展到與美俄鼎足三分，然而這種情勢不會維持很久，最後必會變為兩大強國對峙的局面，如果由鼎足三分變為二強對峙的局面時中國被滅掉了，那麼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族便從此滅亡，永不再起。但是我們無妨再作進一步的假定：當鼎足三分變為二強對峙的局面時，二強中仍然有一方是中國人，那麼這二強雙方必然會再進行決戰，最後一強併吞他強，獨霸天下，其可能性有二：一是中國人一方被滅掉了，二是中國人滅掉了對方。如果是第一種可能性，那麼其情形會與上述三強變為二強的情形一樣，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族從此滅亡，永不再起；如果是第二種可能性，這情形俟容後再論列。

現在我們先來談第一種情形，就是如果中國一旦遭西方滅亡，那麼中國民族乃至中國文化便從此滅亡，永不再起。筆者願大家明白一件事實，就是一個民族的存在與它的文化是不可分的，文化存在，民族便存在，文化不存在，民族便滅亡。過去我們中國人曾兩次遭異族侵入，而仍能